

中国在现代化中途

「三农」问思

曹东勃◎著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颠覆性的变迁过程，其核心内容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置身于这一幕宏大历史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三农”问题虽已被推入现代化轨道，却滞留于中途——此间充满了共时性、整体性和复杂性，让人困惑，也催人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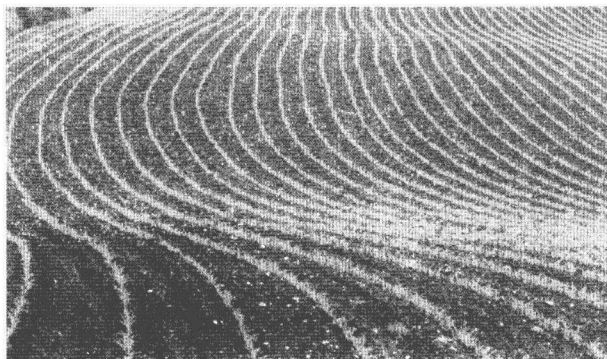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滞后在现代化中途

「三农」问题

曹东勃◎著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颠覆性的变迁过程，其核心内容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置身于这一幕宏大历史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三农”问题虽已被推入现代化轨道，却滞留于中途——此间充满了共时性、整体性和复杂性，让人困惑，也催人思考。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滞留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曹东勃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017-9374-7

I. 滞… II. 曹… III. 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 ②农村经济-研究-中国 ③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F32 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0130 号

责任编辑 李煜萍 (电话: 13691313466, E-mail: pkulyp@163.com)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地矿印刷厂印刷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310 千字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017-9374-7/F·8272

定价 35.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68344225 88386794

序 一

胡景北*

曹东勃同学收集整理了他近年来写作的有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主要文章并编成这本书。他请我作序,理由是我熟悉“三农”问题。对这个理由我不敢认同,因为我没有专门学习过农业经济学;住在城市也久不下乡了,所以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都有了隔膜。但另一方面,即使谈不上熟悉,我仍然很关心农民、农村和农业。因此,我愿意为比我更熟悉也可能更关心“三农”问题的东勃的这本书作序。

东勃为这本书取的书名《滞留在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很有特点。东勃的专业是经济哲学,他本人对大历史很有兴趣。“现代化中途”一说便是一种大历史观的反映。一方面,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在总体上已经走出了前现代化并在现代化的路程上走了一段路,另一方面,它们又还没有走完现代化的路程。同时,中国各个地区走的速度有快有慢。所以,正如东勃指出的那样,“当下的中国,许多领域都正处于前现代问题、现代性状况和后现代体验交织并存的时空背景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呈现出]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复杂的现状”(方括号内容为我所加)。这样一个“现代化中途”的复杂现状,既给我们观察、思索和分析中国“三农”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又给我们建立理论、提出政策、实施方案造成了巨大的机遇。每一个关心中国的人到中国农村走一趟,都会同时感受到困难和机遇。东勃现在刚刚26岁,比我整整年轻30岁。如果说我这样的年长者到农村看到的更多是困难,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必然感到机遇,感到自己大有用武之地。正是因为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还有那么大的困难,正是因为只有农民、农村和农业现代化了,中国才可能现代化,年轻人才有了在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上建功立业的机会。我认为,东勃在这本书里告诉我们的他的思考,表现了年轻一辈在中国“三农”问题面前的勇气和信心。

如果我在30年前的1979年写这篇短文,我一定会接着上一句“自动地”加

* 作者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意志银行基金教授,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并长期关注中国农民问题与相关研究。

上“有了这样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三农’问题一定能彻底解决”之类的话语。但今天,我明白仅仅有勇气和信心还不够。解决“三农”问题,我们还需要理性,需要宽容,需要抵制任何极端的或“绝对正确”的口号。我很高兴地看到,比我年轻 30 岁的东勃现在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他不但在本书前言内反对把学术讨论变成政治问题,提出对各种观点都“需要作同情之理解”,而且在全书中贯彻了这样的立场。无论是关于小农经济性质的探讨,还是中国现行粮食储备制度的改革,抑或 18 亿亩耕地红线的讨论,甚至对“丁磊养猪”一类的小事,东勃都抱着既明确自己的看法,又同情别人的想法,并愿意平心静气讨论的态度。正如东勃在本书讨论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大饥荒时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当年在有勇气、有信心的同时多一些理性、多一些宽容,大饥荒本来是可能避免的。今天,我们曾经亲历大饥荒的人理解了这一点。但中国要在未来完全避免大饥荒的悲剧重演,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便更需要理解这一点。从本书中,我很高兴地看到 21 世纪初的年轻一代在“三农”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表现出的理性与宽容。

我是相信人类普世价值的,所以在作“同情之理解”时,我愿意同情地理解所有事情、所有观点、所有人。其实,只有当我们作“同情之理解”时,我们才能够揭示那些事情、那些观点、那些人的合理性,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竟然能够发生和延续,也才能够明白何以避免错误事情的重复。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无疑有国际的因素,中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亦需要借鉴国际的经验。就此而言,我希望东勃与其他年轻人在认识和分析中国“三农”问题时,也能够对相关的国际因素、国际经验有更具历史性的“同情之理解”,深入研究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制度逻辑。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三农”问题,尤其是农业问题,开始和世界农业状况联系起来。东勃在本书讨论 2007 年中国粮价上涨时多次表明,2007 年发生在中国的粮价上涨和国际粮食市场供不应求有关。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东勃指出的中国国内粮价和国际粮价的紧密关联,在 1949 年以后的中国粮食和农业史上是一个新现象。他高度关注这一现象,多方面地讨论了它对中国粮食供给、粮价、粮食储备、跨地区粮食调运的影响。不过,东勃对这一现象的国际方面着笔不多。这里,我想就国际粮食市场尤其发达国家农业问题补充几句,以求教于东勃和本书的读者:

(1) 我们常说的发达国家农场主,英文是“farmers”。这个词的英文原意是农业工作者,或者就是没有褒义和贬义的农民,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farmers 被翻译成农场主,我想是因为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农场主”更容易被归纳到阶级斗争的框架中,而农场主自然属于资产阶级

了。所以,和农场主有关的中文语句几乎都是贬义的。现在我们离开阶级斗争框架,这样的误解是应当结束了。和东勃一样,我也希望中国农民早日脱离户口制度束缚,成为自由公民。那时,他们在英文文献中就不应当是 *peasants*,而应当成为 *farmers*,即作为公民的一部分的农民了。

(2)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都强调低价粮食。如果说这些国家有什么经济方面的国策的话,那就是“粮食低价、能源低价”。几乎每个中国人到了发达国家,都发现那些国家吃得很便宜。即使在用粮食造汽油的今天,发达国家依然保持着低价粮食政策。粮价上涨对它们也不一定是好事。例如 2007 年,美国粮价随国际粮价上涨后,美国政府虽然财政入不敷出,也得对低收入家庭实行粮价补贴,发放“粮食券”。

(3)发达国家的粮食市场是开放的,可以说他们的粮食市场就是国际粮食市场。至于有时候国际市场粮价超过中国国内市场粮价,那有很多原因,很难直接用发达国家的“粮食高价政策”解释,就像有时候国际粮价低也很难用发达国家的粮食低价政策解释一样。东勃在本书中曾提到一个例子,中国南方几个省在 1994 年以前大量进口粮食,1994 年中国大幅调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按人民币计价的粮食价格在国际市场一变而高于国内市场,南方各省于是转而到国内的东北、华北地区采购粮食。由此可见国内国际两个粮食市场的联系是很复杂的。

(4)发达国家在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中途”,以及在今天,都面临着保持粮食价格低和保证农民收入不低的矛盾。它们缓和与解决这个矛盾的方式之一是政府对农业的高投资和对农民的高补贴。前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粮食价格低,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收入不低(当然仍然低于其他部门工人的收入,只是低的差距不是那么大而已)。我们都知道发达国家许多经济学家反对政府补贴农民,可我们很少知道那里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埋怨农业投资过度。“农业投资过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谭,但在发达国家,根据我目前的了解,它们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是说还在“现代化中途”,便已经“农业投资过度”了;大约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发达国家便走出了“粮食供给不足”的阴影。

我的这些了解和理解不一定准确,因为我对发达国家“三农”状况了解不多,而“同情之理解”不一定就能够得出正确的理解。不过,“滞留在现代化中途”的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值得我们关心,“滞留”状态更值得我们去改变。当然,我不认为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目前处在“滞留”中。但即使它们目前没“滞留”,它们在最近的未来依然存在着滞留的严重危险。为避免这一危险,为中国彻底摆脱“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中国需要对“三农”问题

的更多理性思考和扎实研究。东勃这本书正体现了这样的思考和研究。同时,本书用通俗语言生动解说和讨论了中国“三农”问题和有关理论。这种解说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最终靠的不是书斋内的研究,而是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广大民众,靠的是大众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理解。想到这一点,我非常乐意为曹东勃的这本书作序。

胡景北

2009年9月7日夜于上海

序 二

时寒冰*

在担任《上海证券报》评论主编期间,当我第一次阅读曹东勃先生的作品,立即感受到一种阻挡不住的迎面而来的清新——不仅是为他的认真、细致和严谨,更为他用智慧的眼睛所洞悉到的事实、探寻到的问题症结和提出的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建议。

我出生于农村,对农村之苦有切肤之感,也努力探究“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在阅读曹东勃先生的作品时,常常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虽然研究“三农”问题,按照曹东勃先生的说法,只是他的第一副业;但我认为,他的研究成果,常有智慧的灵光闪现其中,并不逊色于一些专业学者。

但凡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且能有所斩获的人,一定源于某种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我在东勃的书中找到了答案。东勃的祖母,这个国家亿万淳朴农民中的一员,给他带来的植根于骨髓的感动:“没有她这把大伞在阴霾的时代里遮风避雨,没有她这株大树在和平的岁月中荫庇子孙,没有她坚强的肩膀扛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哪怕是吃糠咽菜啃树皮,也终于把儿女们抚养长大——我们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就延续不到今天。”

这种朴素而纯粹的感恩意识,成为曹东勃先生研究“三农”问题的持久源动力。这一点,我与他有相似之处。我的曾祖母(父亲的奶奶)在大饥荒中活活饿死,这一惨烈的记忆,成为我一生为弱者权益疾呼、为“三农”问题疾呼的最大动力。

正因为这些共通之处,我视曹东勃先生为兄弟。这次他寄来书稿约我作序,我畅读全篇,欣然同意。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与农民利益诉求权利的弱化

《滞留在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一书,是曹东勃先生对“三农”问题长期以来认真思索和深入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他认为,当今世界农业格局存在着一个结构上的悖论,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朝着扭曲价格体系的方

* 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人,《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首席评论员。

向行进,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发展进程中的粮食保障问题而将其国内粮食价格长期人为地压低在一个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发达国家为应对其国内农场主利益集团的攻势而将其国内粮食价格人为地设定在一个通常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形成的后果就是,发达国家的农民得到了政策性担保,生产积极性更高,结果粮食过剩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受到抑制,生产积极性减退,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激化。

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差距,源于国内外农民表达利益诉求权利和渠道的不同。我在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与曹东勃先生的一致。

1978—1984年间,我国农民名义与实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7.7%,两者相差仅0.2个百分点。而在1992年至1995年间,农民名义收入年均递增22.0%,实际收入仅递增4.8%,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惊人的17.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扩大。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到2003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24:1。到2007年,两者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32:1。

1993年,为何会突然成为一个影响农民收入变化的分水岭?

它与我国农民参政机制的变化有关系: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占代表比例为29.4%,第七届时还占到23%,第八届(从1993年起)时降为9.4%,第九届降到8%,第十届为8.4%。我国农民的收入变化与其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的变化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趋同性!

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降低,使得农民的话语权呈现出明显的弱势。尤其是在我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强势的声音更容易对相关政策的产生直接影响。

数据表明,恰恰是从1993年以后,我国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却非常之低。农工产品的“剪刀差”迅速扩大,到1994年时,已经达到670亿元,如果算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数额就更大。就连取消农业税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也很快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所吞噬。而且,同样由于农民话语权太弱的缘故,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农民话语权随着其在人大代表中构成比例的降低而被削弱,这也影响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数据表明,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平均在15年以上。由于公共投入不足,农村居民要承受更大的负担。比如教育,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不足全国教育投入的1/4,导致农村不少贫困

家庭子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医疗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我国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但是,我国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一度不足城市的1/6,因病陷于贫困或生病无钱治疗的状况在经济落后地区非常普遍。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农民参政能力的提升,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当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满足私利,不断弱化农民的话语表达权,“三农”问题就容易恶化。事实上,近年来日益上升的上访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绝大部分与农民利益被侵害有关。

也正因为农民政治地位的低下,造成了曹东勃先生得出的结论:在农业作为幼稚产业的国度中,通过人为地抬高工农产品比价和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即舒尔茨意义上的农业的收入流来源价格)扩大工农剪刀差,通过以城市为中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大型工业项目建设,通过对农业生产与流通环节的政府控制,通过高强度的农业税(这应当理解为包括强制征收和低价征购农民粮食的各种实物和非实物的税负,以及为防止粮食产出流向国际市场而征收的高额出口关税)和低代价地汲取农村储蓄,为城市发展和建设提供资金融通等逆向转移支付的措施,推行偏袒工业与城市的政策,剥夺农业剩余,遏制粮食增产和农业发展,于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就被人为地压低在一个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

二、粮食安全重于一切

中国有一句古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反过来说,就是“手中无粮,心中惊慌”。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最核心、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一些学者以简单的眼光裁剪复杂的现实,得出了一些带有明显偏误、极易产生政策与社会误导的结论。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在2009年初发布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认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对此,曹东勃先生的观点是:当前的中国耕地面积仅为18.26亿亩,即便是这紧巴巴的18亿亩耕地,也不完全保持在最宜耕种的状态;农业生产是一个生物生产过程,无论是作物种子还是栽培方式,农业技术的转移都必须在转入方进行适应性、本土化的改良与适应性再研发、再扩散,不可能一劳永逸。

他进一步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的研究和预测,201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应为420公斤,全国粮食需求总量为5.88亿吨;203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应为440公斤,全国粮食需求总量为7.04亿吨;而我国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粮食产量是5亿吨左右,技术进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程度有限;粮食复种指数已经由建国初的130%上升到160%左右,继续提升的潜力有限;又由于我国正处

现代化进程之中,粮食消费发生结构性转变,粮肉之争、粮饲之争、粮经之争明显,纯粮作物比例还存在下探空间。如此,则 18 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就绝非危言耸听:实际上它并不宽裕,也很容易失守。这也是“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畜争饲、不与田争水”这二十字基本原则应当长期坚持的国情基础。

一些对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过于乐观的学者们,不仅忽略了国际上的粮食贸易规模尚且无法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这一基本事实,更忽略了粮食战争的巨大危险性。

自古以来,粮食都是战争的利器。春秋时期,齐国国王命令大臣们必须穿丝制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齐国丝需求量大,价格上涨,邻近的鲁、梁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几年后,齐王又命只准穿布衣,且不准卖粮食给其他小国。结果,鲁、梁等小国因饥荒而大乱,不战而亡,齐国渔翁得利,坐享其成,使疆土得以扩张。

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就这样说过:“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在未来,粮食战争将是比石油战争和货币战争更可怕、杀伤力更强的武器。

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 42.7%,玉米产量占 34.4%,小麦产量占 11.6%,出口量占据全球粮食出口的半壁江山,粮价上涨它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一旦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拿起粮食武器,中国如何应对?

2007 年,全球 30 多个国家因为粮价的疯狂上涨而发生骚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响亮的警钟,一旦粮食供给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曹东勃先生围绕耕地问题的有关思考和论述,不仅反映了他丰富的资料积累和严肃的研究态度,其鲜明的立场更反映出一位研究者对国家粮食安全乃至民族存亡问题强烈的责任意识。

三、解决“三农”问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在本书中,曹东勃先生指出了“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认为:农业技术进步不是一项私人投资和私人产品,它是具有很大正外部性的公共品。因此,农业技术的研发不会成为一项对私人有利可图的事业。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承担起科技研发和推广普及活动。进一步的,政府对农产品在价格上的保护和贴补政策,也应当让位于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投资,这正是世贸组织“绿箱”政策的要旨。现代化是从城乡分离起始的,现代化的源头必须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基础结构中去找寻。廉价食品的时代显然结束,全球抢粮的局面业已形成。面对农产品通胀,人类政

策的拙劣表演也越发达到一种新的境界。但应当看到的是,对价格干预政策长期效果的自负可能会自食其果,因为廉价食品并不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这些文字虽然平静如水,却把曹东勃先生的忧虑表露无遗。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研究者,这种警示本身就是一种呐喊。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曹东勃先生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建设性的建议: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角度看,在我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走出这一农业两难困境的主要动力仍然存在于内部,取决于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制度诸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而在技术、资本、劳动力素质等要素在短期内无法取得大幅提升的前提下,在资源环境约束越发趋紧的状态下,我们能够寄予厚望的,唯有进一步的制度创新。

而要做到制度创新,确保农民的话语权和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加大对农业的科研投入、基础设施投入,等等,是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一点,其实是有捷径可走的,借鉴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就是最佳选择。

当我查阅有关美国的农业政策时,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震撼,美国在确保农民利益和粮食安全方面的政策是非常系统和完善的。比如:限耕政策——旨在分配和限制农场主生产某些农产品的最大面积;休耕政策——对生产严重过剩的农产品实行休耕;补贴政策——如果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政府按照“目标价格”与实际的平均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对农民进行补贴;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通过扩大农地、草地、湿地等保护面积,加大对耕地保护、水利设施方面投资,以改善土壤状况和环境质量;发展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联邦政府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讯事业,同时,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

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帮助农民分担风险,美国早在1933年就推出了无追索权贷款。农业部建立商品信贷公司(CCC),向接受计划控制的农场主发放无追索权贷款。在农产品收获以后,农场主用自己的农产品作抵押,获得为期10个月、数量为计划农产品限额与贷款率之乘积的短期贷款,以待最有利的时机出售农产品。如果销售年度的头5个月的市场价格高于贷款率加利息,借款人有权选择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产品并偿还贷款本息;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贷款率,借款人可以把产品交给商品信贷公司以偿付全部贷款,由CCC承担损失。

这样,无论丰歉,农民的利益都得到了保障。

而在我国,当2008年底北方遭受旱灾时,农民竟然无法浇地,因为水利设施和灌溉设施欠缺,农民干脆听天由命。当农民的种粮收益与成本比较接近、无利可图时,其积极性必然受挫,土地撂荒现象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粮食安全隐患就如影随形。

对于主产区“憋粮”等问题,曹东勃先生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是指出了国家粮食临时收储政策设计的若干问题和惠农政策在流通中耗损的机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比如:加强主产区粮库仓容建设,提升粮库硬件设施水平;加强主产区粮食精深加工能力建设,促进原粮的就地转化;加强主产区地方粮食储备库经营管理,形成对国家粮食储备的有力补充和支撑;等等。

《滞留在现代化中途——“三农”问思》一书,包括农业经济、粮食研究、千村调查三部分,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我所列举的,只是点滴。值得一提的是,曹东勃先生对于大饥荒问题的研究和反思,让我深深地共鸣。阅读这些文字,心中之痛难以自抑。历史是一面镜子,血的教训需要我们永远铭记。

东勃是1983年生人,在如此年龄就能如此深入地思考和研究,是一个令人欣慰的开始。我祝愿他一路走下去,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为社会奉献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时寒冰

2009年8月30日

前言与致谢

本书是我自2007年秋读博以来撰写的有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主要文章的汇总。我的专业是经济哲学,研究方向本与“三农”没有直接联系,甚至可说是相去甚远。但我把“三农”问题作为我的“第一副业”,至今也有五年时间了。个中缘由,我在本书第三篇中专门用《“千村调查”感言——我为什么喜欢研究“三农”》一文作答,这里只简单交代一二。

梁漱溟先生在他35岁时的一篇著名讲演中,在否认了“学问中人”“事功中人”之后,以“我大概是问题中人”自况。秦晖教授曾说:“我有两句话,一句叫做:‘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理论’需自立;另一句是:弘扬‘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我对“三农”问题的兴趣,首先是对“问题”的兴趣。这主要得益于我的父亲,他是在粮食领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技术专家,同时也对粮食企业经营管理和国家粮食政策有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早在我本科时期,父亲时常在我寒暑假回家之时启发我思考农业特别是粮食领域的诸多现实问题。从那时起,我对观察经济运行体制机制中的诸多漏洞便有了极大的好奇心。久而久之,在书斋里研读经典、游离于经济现实之外的我,也不免对这些“俗世”问题多了几分关注。几年下来,图书馆里中图分类法“农”字辈的书籍,至少在书名和摆放位置方面,也大体能够做到“信手拈来”、随用随取了。有时,为求更好的理解,经常在一楼的社会学、二楼的经济学、三楼的农学这几个不同学科的书架间来回流窜。

读书之余,也逐步有了言说表达的意欲。循着问题意识的流向,几年来,断断续续地就一些历史性或时效性的论题留下一些思考的轨迹。集腋成裘,便成了本书。书名取作“滞留在现代化中途”,原因有二:

其一,这是我发表在《读书》2008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滞留在现代化中途:转轨国家的农业之惑”,这是我当时阅读一些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著作后,对处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农业产生的困惑与思考。在本书中,将该文题目更改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两难困境”,置于篇首。

其二,我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专业都是经济哲学,硕士阶段阅读了

大量有关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著述,并在2007年以此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其后两年来,尽管我投注了较多的学术精力在农业经济等具体领域,但“现代性—后现代性”论题仍时时萦绕心头,相应的思考并没有淡去;反而是在研究细碎的具体问题和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越发强化了这一分析框架下的问题意识。我以为,当下的中国,许多领域都处于前现代问题、现代性状况与后现代体验交织并存的时空背景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复杂的现状,需要多重视角和多种分析。独断论式地贬斥和推崇任何一种理论模式并使自己的头脑固化,抑或动辄将学术讨论绑赴意识形态的法场,都是极不足取的。我们需要作同情之理解,持多元之立场。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总有一种野心或抱负,希图以最少的变量和假设解释最多的现实,勇气可嘉,但若任此一端独大而对复杂性现实随意裁剪,理论也就丧失了严肃性,损伤了解释力。这几年阅读中的一个切身感受是,能够真正带给我有益思考和启迪的文献,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建立在对复杂性现实的深刻洞察基础之上的有力分析。落实到“滞留在现代化中途”的中国农业这个领域,就需要充分估计和考虑到转轨现实中的共时性、整体性、复杂性,既要有选择地“拥抱”现代农业,同时也应拾起我们传统农业中的合理成分,还要充分倾听国外业已兴起的诸如后现代农业一类的声音。对于因为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产生的“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剔除那种恶意的意识形态纠葛和无谓的“古今中西”之辩,还是应当审慎观察,不宜意气用事而完全拒斥。

本书正文部分收录了22篇文章,分为农业经济、粮食研究、千村调查三部分,既有对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两难困境的思索、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小农经济改造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有笔者在与乡村干部和农户的实际访谈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及对其的分析,还有对当下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现实关切和对其背后的体制机制层面的思考;另有6篇有关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老龄化时代养老模式的转变、医疗改革的民生经济学分析以及官僚制等虽与本专业无直接关系,但也属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观照与研究的文章,则作为本书的外篇一并收入,以体现问题导向和业余爱好的特征。

书中的文章大多已公开发表在《读书》《改革》《中州学刊》《财经科学》《财经问题研究》《书屋》《上海证券报》《东方早报》《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在此要特别向《读书》杂志贾宝兰女士、《上海证券报》时寒冰先生、《东方早报》刘景先生和其他各期刊的编辑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在三年前担任学校研究生会分管学术方面的副主席期间,曾邀请原任我

校经济学院院长、后任教于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的胡景北教授来访并作学术讲座,由此与胡老师结识。在思考农业发展方面的问题时,阅读胡老师的文章时常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胡老师为人谦和、坦荡、平易近人,乐于提携后学,但此次向他索序,也仍有冒昧之感,得先生慨然应允,至为荣幸。《上海证券报》时寒冰先生的正直敢言和犀利文字,每每让我受益良多并有所共鸣,因此虽素未谋面,却也似熟识已久。寒冰兄此次拨冗作序,对我而言无疑也是极大的鼓励。在此,我要向胡景北教授和时寒冰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收录的若干学术论文曾经入选国内一些学术研讨会并作专题发言,这里也向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湖南大学、西南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等主办方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

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一篇文章是我与本校其他六位同学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一期项目这一平台基础上进行合作并由我执笔完成的,该文获得了第十一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上海赛区的特等奖并将于2009年10月参加全国决赛,这里特别对余红老师和章益国老师的指导、对我的六位课题组成员的出色协作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师弟潘澍原在本书的编排整理过程中提供的许多宝贵意见;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编辑李煜萍女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热情鼓励、悉心审校和大力支持。没有上述帮助,本书的出版不会如此顺利。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学术期刊与财经报纸的不同需求,个别文章在论题上可能存在一定的重复,文字表述上的风格则不尽相同,在篇章布局方面一律按论题的关联性排列而并不将学术论文、散文和杂文截然分开。对于上述技术原因可能给读者带来的不便,首先在此致歉。

此外,限于学识、视域、能力及阅历,本书的疏漏、牵强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而我作为一个非职业研究者,在初涉“三农”领域的过程中,在观点和方法上也有这样那样的软硬伤。我所聊以自慰的只能是自己对“三农”的研究兴趣出于内心深处的真实呼召,因而,尽管还很很不成熟,但作为兴趣研究和学术探险过程的一种记录,我仍然希望看到本书的出版。当然,对于前述各种不足之处,我仍要承担全部责任。恳请并感谢各位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使我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整理本书的工作行将完成之际,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她也是我们这个国家亿万淳朴农民中的一员。奶奶喜欢“讲故事”,讲过去在农村的艰苦岁月中发生的真实故事。20世纪50年代末,我的爷爷,作为一个教书人,因为响应党中央的呼吁、直言时弊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久又在三年大饥荒中因胃病去世,留下19岁的大伯、12岁的姑姑、7岁的二伯和当时只有4岁的我的父亲。那是

新中国成立 60 年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也是奶奶 90 年生命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自力更生已经不是自主选择,而是一种必然。在经济普遍贫穷、所有人都在生存线上日夜挣扎的时代,乡土中国、乡村社会的那种传统的亲友互助的社会关系根本无力挽救,一切只有靠自己。我的奶奶是一个坚强的人,是那个时代的女强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没有她这把大伞在阴霾的时代里遮风避雨,没有她这株大树在和平的岁月中荫庇子孙,没有她坚强的肩膀扛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哪怕是吃糠咽菜啃树皮,也终于把儿女们抚养长大——我们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就延续不到今天。奶奶没上过学,识字也不多,但是她懂得知识的意义,推崇读书人,鼓励子孙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奶奶是去年初过世的,临走时我没能在她身边守候,这是永远的遗憾。假如奶奶在天有灵,我愿把本书献给她,寄托我无尽的思念。

曹东勃

2009 年 7 月